

水浒传

儒林外史

西游记

聊斋志异

三国演义

翁再红 著

走向经典之路

ZOUXIANGJINGDIANZHILU

——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

YIZHONGGUO GUDIAN

金瓶梅
XIAOSHUO WELLI



南京大学出版社

走向经典之路

ZOUXIANGJINGDIANZHI LU

——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

YI 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WEILI

翁再红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 / 翁再红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7-305-13962-8

I. ①走… II. ①翁…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7733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

著 者 翁再红

责任编辑 刘 平

编辑热线 025-8359214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7.5 字数200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3962-8

定 价 28.00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胡有清

在翁再红读博的那几年里,文本是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学界重视和热议,首先和我国文化发展的大形势有关。上世纪后期以来,各个文化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频频出现,各种挑战既有文学秩序的观念和举动也顺理成章地出现。和西方早些时候关于经典的讨论一样,文学经典正是作为既有秩序的某种标志物而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从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对于经典的重视则与关于文学基本观念的争论有关,文学不能有定义与经典地位不可能永远不变,两种观念之间无疑互相关联并互相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问题的思考也就牵涉到对文学本体的思考,并延伸到对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切,兼有通常所说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我支持了翁再红在这一领域选择博士论文的选题。现在,七八年过去,经典热已经降温,人们对文学艺术基本性质与特点的认识也在深入,《走向经典之路》这本专著仍以其恰当的立意、合理的视角和细腻的论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给

人们正确地认识文学经典以至更多艺术经典提供借鉴。

什么是经典？本书作者和众多论者一样都作了中西文词源学的考察，并且指出，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经典已经更多地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也就是说，经典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了某种发展与变化。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们似乎还未能深入研究这种“长期的词义演化”过程，考证现代意义上的经典一词开始使用的比较准确的时间和范围。试想如能有这样的实证，对于深化认识经典包括文学经典一词的现代意义一定会大有益处。依我之见，现在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一词的使用，大体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的区别：第一，是公共意义的经典。这就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优秀作品，最典型的是进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经典作品，另外还包括一些进入大学教科书和标明经典的评选推荐书目、作品选本或文库的作品。第二，是文体意义的经典。本书所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就首先属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它们作为文体经典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公共经典的意义；虽然公共经典一般都是文体经典，但并不是所有文体经典都可以成为公共经典。第三，是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前两个层次的经典当然都会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史经典；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在文学史上具有某种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如新文学初期胡适的诗集《尝试集》，新时期文学初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起到过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时过境迁以后，却因为自身的局限，往往并不能对公众或文体发展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它们作为文学史经典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

美国学者乔治·迪基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其地位是

人授予的,这种授予艺术品地位的活动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即艺术世界中的制度和惯例。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主要包括艺术家、报刊记者、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史学家、美学家等等。另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则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他们所说的“艺术世界”和“特定的社会”,“惯例”的“授予”和“文化”的“裁决”,同样也适用于文学经典的构建。上述三种经典的构建都是多种文化观念、美学观念、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是非官方的、非确定性的公众共识的产物;其范围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又以第一层次变动往往更多。至于个人或群体在此过程中,发表各种意见,形成“个人的经典”,则成为推动经典构建中的一股力量,既可能影响到经典的构建,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总的来说,经典指的是优秀的、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的作品。文学经典是这样,其他艺术经典是这样,其他领域的经典也是这样。只不过所谓优秀、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这些标准,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审美风尚下,在不同的个人或人群那里,都会有差异、变化或调整。在现代社会中,经典的地位常以进入教材、权威部门发布的书目等形式得以确认。因为受数量的限制,在经典尤其是公共经典的认定上,竞争、挤兑乃至斗争就不可避免了。甄选经典是为了找出最好的,争论经典是为了辨明哪些作品是最好的。经典建构包括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优秀文学作品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从中我们不难体会研究经典问题的意义。

《辞海》1979年和1989年以后的版本对“经典”词条的表述有微妙

的差别。1979年版的释义是两条,一是“指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二是“指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后来的释义则把第一条改为“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经典有“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差异,后者则略去了这一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重要”或“有指导作用”并不因此就可以超越时空获得永恒了。透过这一词条打上的时代烙印,我们不难看到对经典认识的两种思路的分野。

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存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思路,一种偏重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与判断,另一种则偏重把文本放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审视与评价。前者往往强调文学经典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水准,后者则过多关注与强调文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参与经典建构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审美本质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的分野。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从特定角度揭示了影响经典建构的重要原因,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具合理性,但并非完全对立。作者提出同时关注这两个维度,力图揭示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站在一个更加辩证的立场上研究和揭示出文学经典建构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从文体命名与合法化、文学活动诸环节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影响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因素,显得视野开阔。其中,对于文学活动诸环节中创作主体、阐释主体、传播主体的不同作用,其他各种文化因素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作用,都有较好的分析。前者相互之间的延续、发展或张扬,后者相互之间的对抗、纠结或妥协,通过作者的梳理和描述,给人以明晰的印象。本书关于文体的命名与合法化和经典建构的关系的讨论尤

其富有新意。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经典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对于本书所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其中的长篇小说,又确是其成为公共经典的第一道门槛。对于今天的小说,这一门槛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对于其他文体来说,这一门槛仍然不是可以随便逾越的。例如相声和小品,它们各有自己的文体经典,像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赵本山的《卖拐》等作品,无疑都是相声或小品的经典之作,应该也是说唱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将其纳入公共层面的文学经典。网络上标明经典的作品不少,但同时网络文学难成经典的感叹也常在网络上弥漫,而其“难成”的正是公共经典。二十年前,曾有过一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争论。那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次经典的文学经典重构事件,而金庸能够入选,与鲁迅、沈从文等人并列,应该说与通俗文学的盛行和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这些也正说明,只有在文体获得进入公共经典的合法性以后,文体经典才能成为公共意义的文学经典。

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文学评论、文学史编写、文学(语文)教材编写、选本、书目等方式,这些方式的运作中有各种审美观念、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博弈,出现不同的经典衡量标准。这些标准总起来说也是两种,一种重视经典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强调其客观性、稳定性和历史性;一种重视经典的规范指导意义,强调其主观性、变动性和当下性。在这种博弈中,人们最终形成某种具有较大公约数的共识,对于更强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规范、指导和启迪意义的公共经典来说,这种共识就更显得必不可少。现代社会中,官方、精英、民间的意志更多是在上述文化运作中实现平衡和协调而形成共识的。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官方正式的“经典”名单公布。某些时候出现

的某种“推荐书目”一般也并不可能等同于“经典”书目。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如大话、戏说、戏仿等,实际上是在认识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常常带有借助经典的影响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的意味,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于社会共识形成的经典的权威地位。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常与体裁、主题、题材等范畴联系在一起,如可以有长篇小说经典、爱国主义经典、山水诗经典;又常为时代、地域、国家、民族等因素所制约,如本书所论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除了“小说”这一范畴限制外,又包括了“中国”、“古典”(古代)等国家、时代因素的限制。经典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今天很难再产生《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经典又具有普适性、当下性,《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对于人们认识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进而了解中国都大有裨益,在艺术上仍可产生美的启迪。虽然每一部经典作品的普适性、当下性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学史的经典性。

作者选取中国古典小说作为对象来研究经典问题,这个角度有其优势。首先,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经典化确实反映了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性及其建构的多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文体合法化的问题,就不是其他所有文体的作品都会遇到的,例如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包括其经典的形成,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其次,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本身地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19世纪末新的文学观念逐步形成以来,它们就被授予文学经典的地位,即使在某些时候人们对其中某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其经典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受到影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选取的研究对象就避免了对其经典性的争议和疑虑。再次,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长期受学界重视,其经

典化过程已有较多学者进行考察与研究。虽然这些研究较多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研究角度也并不一定是从经典出发,但无疑给本书的整合性、理论型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坚实基础。作者高度重视利用这些条件,大大增强了论述的历史感与说服力。

本书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成为小说经典的过程已有较多的论述,但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对其成为现代意义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则尚未能充分展开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在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因为有新的历史环境、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产生新的建构主体、观念与机制,本书论及的经典化诸因素中,如小说文体合法化,作者的地位、读者的选择、批评家的阐释、媒体的传播,特别是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等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与调整。例如:传播媒介上就先后出现了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金圣叹时代不可能的新事物;而在批评方面,则出现了现代的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现了西方文学观念、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和借鉴,出现了专职从事文学研究、教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研究的人群;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阅读和欣赏的多样性,也使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出现了不可小觑的变化;经典作品的改编也不限于戏剧等传统形式,而是通过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这些形式扩大了传播与影响。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活动过程。而在社会文化机制方面,现代与古代相比,其差别更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也是异常丰富的:政治话语对文化的介入对经典建构的影响更为直接、广泛和复杂;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古典小说有浓厚的兴趣,给予长期而深入的关注,对几乎所有的名著都有自己的评论;大学、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学会等现代文化机构的出现和活跃,也给精英话语的

凝聚、提升和张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给民间话语的发声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化研究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复杂的空间，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对于经典研究来说，也是更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话题。

令人高兴的是，翁再红已经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艺术传播学视域下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我想，作者从艺术传播学角度开启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新的航程，将会在上述领域或话题中有自己的收获。再红是一位富有挑战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青年，相信她一定会在经典研究以至更多的学术研究中执著追求，不懈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我祝福并期待着！

甲午谷雨于仙林南大和园

目 录

001	序
001	导 论
011	第一章 文体命名及其合法化:文本何以进入经典序列
012	第一节 文体命名:文本实现经典化的基本前提
013	一、文体的命名与文本的经典化
017	二、“体以代变”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025	第二节 自身合法化: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命名之路
026	一、小说文体的萌芽期:有其“名”而无其“实”
030	二、小说文体的自律期:有其“实”而无其“名”
036	三、小说文体的认同期:有其“实”且有其“名”
042	第二章 传统与个人才能:作家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043	第一节 传统:经典文本生产的惯例系统
045	一、作为文化惯例的思想传统
049	二、作为常规惯例的“慕史”传统
055	三、作为专业惯例的小说传统

061	第二节	个人才能与经典建构:从文人加工到文人独创
062	一、	为后世立法:“天才”与“经典”
067	二、	文人加工与独创:经典文本的生产方式
082	第三章	文本阐释与遴选:读者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083	第一节	经典文本的阐释及其有效性
085	一、	文本阐释的有效性何以可能
091	二、	经典文本阐释方式的多元化与民族性
096	第二节	评点的意义:专业批评家与文本经典化
096	一、	文本遴选的裁定者
102	二、	美学价值的总结者
107	三、	大众阅读的引导者
115	第四章	文本传播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116	第一节	文本传播的意义及其途径
117	一、	文学传播与经典流传
120	二、	经典文本的传播途径
125	第二节	书坊主:经典文本传播的“助产医生”
126	一、	书坊主对小说批评的介入
131	二、	书坊主对小说创作的介入
138	第三节	文本改编:不同艺术门类参与下的文学传播
138	一、	小说文本传播中的艺术多样性
142	二、	艺术门类互通与文本的经典化

148	第五章 权力话语与文学史叙事:经典论争背后的文化宰制
149	第一节 权力话语博弈:经典如何在文化中“建构”
150	一、政治话语:经典遴选规则的审查者
157	二、精英话语:经典遴选规则的制定者
166	三、民间话语:经典遴选规则的影响者
172	第二节 文学史叙事与文本的经典化
173	一、文学史:“建构”经典的历史
179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悖论
184	结 语
190	参考文献
200	人名索引
203	主题索引
207	附录:艺术的经典化与艺术界
221	后记

导 论

如果不求助于经典,我们就找不到各种方式来整理我们对文学和艺术之历史的思考。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围绕“经典”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日益增多。不仅如此,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在内的其他学科,也有很多学者参与到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一时间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毫无疑问,出现这样的局面本身也证明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经典”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文学经典的“经典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又是文本的“经典化”呢?当然,还有经典问题的研究现状、经典论争的焦点,以及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导论中需要一一说明的。

要明确“经典”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首先要从辞源学的角度,分别考察“经典”一词在中西语境下的演变与使用情况。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经”和“典”二字分别作了具体的解释。“经”被拆解为“织之从丝谓之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明:“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

六艺为天地之常经。”^①我们都知道，所谓“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六艺则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表明，所谓“经”，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和标准。而“典”呢，在《说文解字》中被注解为“五帝之书”，其实也就是指重要的文献或书籍。可以说，两个字都具有一种规范或权威的意味，并且主要指向以“三纲五常六艺”为道德规范的儒家典籍。事实上，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经典一词仍然还具有这样的意味。比如，在台湾较早出版的《辞海》中，对“经典”的释文就以儒家典籍为主：“书名凡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采辑。‘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孝经’。凡二百余家又兼诸儒训诂各本之异同，为后世谈经者所宗。”^②但是，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它已经不再特指儒家典籍，而更多地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③与中文“经典”一词相对应的英文，主要有 canon、classic、scripture 这三个单词。国内学者在翻译经典一词时，这三个单词经常被无意识地混用。不过西方学术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意指“canon”。Canon 一词在西方最早被希腊人使用，意指“一根藤条或一个可以度量东西的棍棒”(kanon, 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公元 1 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经典一词逐渐被转化为一个宗教术语。公元 4 世纪，它开始代表经书、律法和典籍，并逐渐意指某种能够充当参照标准，具有权威意义和典范意义的文本。由此可见，中西方对于“经典”一词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致性的。所谓经典，一定是那种可资参照学习的、具有某种权威和规范意味的文本，它们一般都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

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44 页。

② 《辞海》（修订本），台湾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236 页。

③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44 页。

和神圣的地位。

由此出发,我们再来理解“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就比较容易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指出,文学经典其实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能够带来发现的书”^①。所谓“重读”,同样强调了文学经典应该是那些在文学领域中能够充当参照标准,具有某种权威和规范价值的作品。而就外在特征而言,它应该在“内容上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艺术上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接受上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②。这种特征也可以说就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所在。或者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这种“经典性”至少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具有实质上的创造性;三是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四是具有无限的可读性。^③当然,我们还应该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文学语境中的“经典”与带有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的经典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它与官方政治与宗教权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体现出鲜明的择优原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往往是在回溯我们的文学历史时,通过不断比较被逐渐遴选出来的。通过遴选,会有一些文本被认为比其他文本具有更大的保存与继承价值。当我们希望探询这些文本是如何成为经典的时候,研究的重点就不只是经典文本本身了,而是要研究经典的形成与建构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正如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

①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② 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 参见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